



冊年代文化壇點將錄  
冊年代文化壇點將錄

冊年代文化壇點將錄

聰 道

## 目 錄

巴金的命運如何？	一
由「香花」變「毒草」的曹禺	一
不倫生以取辱的老舍	四
冰心女士自殺了麼？	一
丁玲去了何處？	一
電影界的老頭子夏衍	一
戲劇界祖師爺田漢	一
現代孔子蔡元培博士	一
罪惡的產兒郭沫若	二
有驚無險說矛盾	三
無人同情的文霸周揚	三
魯迅可以瞑目矣	四
被紅衛兵「放飛機」的陽翰笙	四
文壇福將鄭振鐸	五
停筆已久的燕紹鈞	五
新文學開山大師胡適	六
左聯常委洪靈菲	七

飛揚跋扈的何其芳	七三
晚年失足的周作人	七六
感情豐富的郁達夫	八〇
詩壇祭酒徐志摩	八三
書生本色的瞿秋白	八六
從書生到政客的何思源	九〇
與冰心齊名的黃廬隱	九四
給藍蘋嘲笑的白薇	九八
女兵謝冰瑩	一〇二
飽受男性欺侮的蕭紅	一〇七
三反健將蕭軍	一一二
文壇怪傑聞一多	一二五
散文名家朱自清	一三五
給毛澤東殺害的王寶味	一三九
丁玲首任丈夫胡也頻	一四六
大小說家沈從文	一五一
聞一多的高足臧克家	一五七
首創新詩理論的劉半農	一六四
幽默大師林語堂	一七〇

## 巴金的命運如何？

住在太平洋東岸的一位朋友，前幾個月來信，向我打聽巴金消息。這位在三十年代因寫「激流三部曲」而譽滿中外的大作家，如今怎麼樣了，是否能夠逃過文化大革命這一關？我想不止我這一位朋友，凡曾熱愛過他的作品的讀者，都會對他繫念的吧。因此，我寫這篇小文，把我所知道的一點，報告給大家。

自文化大革命以來，在中共的正式報刊上，至今還沒有點出他的名字來清算他的報導和文字。去年夏天，在北平舉行的亞非作家協會常設局的會議上，他還以中共作家代表團的成員的名義參加。這是他的名字出現在「人民日報」上的最後一次，此後就再沒有看見他的消息。今年五月亞非作協常設局，又在北平舉行紀念毛澤東延安文藝講話的討論會，中共代表團的名單內已經沒有巴金了。

照馬思聰的例子來看，馬思聰只是因為會作資本主義國家的西洋樂曲，還會演奏資產階級的小提琴，從無反毛反黨反社會主義的言行可以指責。竟被扣上「牛鬼蛇神」的帽子，遭受紅衛兵的毒打，關在等同監牢的地方，失去人身的自由，苦捱無窮無盡的折磨。但巴金與馬思聰不同，因為他有很多可以「入罪」的原因在。

第一、他是有名的無政府主義者。

第二、一九五二年他參加全國文聯所組織的作家羣，到韓戰場體驗生活，寫回來的第一篇通訊，就是「我們會見了彭德懷司令員」，把這位彭大將軍捧上了天。

第三、大鳴大放時他也「放」了幾句話，說什麼他擔任上海文聯主席有職無權，黨對文藝管制得太多。反右時作過檢討，承認了錯誤。

第四、一九五八年，美國共黨作家霍華德·法斯特，在美國報紙上刊登啟事，宣佈退出共黨。中共的「文藝報」向他組稿，要他聲討「叛徒」法斯特。他的文章中却對法斯特寄以無限憐惜與同情。因此亦會遭受批判，迫於作了檢討。

第五、也在一九五八年，他的舊作品中「激流三部曲」、「愛情三部曲」、「滅亡」、「新生」等，全被提出批判，攻擊他最兇猛的一位就是如今文革紅員、江青的愛將姚文元。

第六、過去（解放以前）曾寫幾百萬字的多產作家，十八年來寫得不足過去的十分之一；十年前就着手寫「激流」的續篇「羣」，一直沒有寫成。

這個樣子的巴金，如跟馬思聰相比，豈不是有天淵之別，馬既遭受了慘酷鬪爭，巴金更無理由可以倖免？

巴金的被鬪爭，以筆者推斷，當在去年秋冬之際。因為去年六、七月間，北平文藝界遭工作組和紅衛兵蹂躪時，上海還沒有舉動。稍後，北平的紅衛兵到達上海，即和上海的紅衛兵發生了衝突，在內鬨期間，陳丕顯、曹荻秋還未失去權力，文藝界仍然無事。但不久上海的文革小組成立，號召上海文藝界的造反派「殺出來」，這才全體遭難。

去年年底，上海工人座談，鬪爭周揚黑幫，會有人指出，他們工人的作品會送到「文聯」和「作協」，但「文聯」和「作協」的「老爺們」竟看不起他們的作品，不願意給他們修改。上海「文聯」和「作協」，名義上全是巴金做主席（實權操諸黨組書記葉以羣、孔羅蓀二人之手），自然就脫不了

干係。

在前幾年就以工人作家成名的胡萬春，是上海文革小組的成員，如今已成了張春橋、姚文元的愛將。他在今年五月，為着慶祝毛澤東延安文藝講話發表二十五周年，在人民日報寫了一篇「大立毛澤東文藝思想的絕對權威」，其中指出上海「作協」是「周揚黑店上海分店」，另有一段話這樣說的：「在這次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中還揭發出：過去被周揚、夏衍等人捧為『五四以來有國際影響的大作家』、『一貫靠近黨的左派老知識分子』……是最典型的資產階級的精神『貴族』。他光是錢就有將近卅萬元之巨，大大小小各種各樣半導體收音機就有十多只，住的是三上三下花園洋房，大草坪、大客廳、大書房，富麗堂皇。他過着寄生蟲、吸血鬼的生活，寫的却是反黨反社會主義的大毒草；甚至不惜寫毒草文章為美聯社、台灣「中央日報」提供炮彈，攻擊無產階級專政，反對毛澤東思想。」

這個××是誰呢？就是巴金。他的確有錢了，錢是來自他的舊作的版稅；他的幾部長篇和散文選集、譯作，在一九五三年就重印出版了許多單行本；一九五七年以後，又陸續出齊了「巴金文集」十四巨冊，這些書都很暢銷，定價並不便宜。所以頭幾年他購買公債，一購就是人民幣五萬元。這是見諸大陸報紙正式報導的。香港某一專拍粵語影片的公司，攝製了他的「家」「春」「秋」，片中那位演「大哥」的頭牌男明星，到上海給他送版稅，巴金說自己有錢，不止分文未收，還請那位男明星吃了一頓豐盛的晚餐。那位明星回到香港，就在此間的左報上發表了一篇文章，對巴金這一「義舉」讚揚備至，要不筆者怎能知道呢？

香港的南國出版社，在一九六四年八月，出版了一本「作家巴金」，其中會記載着這麼一件事：「一九六二年年初，香港有一家出版社打算出版巴金的選集，托我代為徵求他的意見，並表示願付一

定的版稅。他回信表示同意，同時說：「不要付版稅或稿費，將來送我幾本書就行了。我現在有的錢自己已經花不了一，錢對我毫無意義。我只希望把工作做好。」他現在生活安定，不需要錢，是事實，……」另外，還有：「他們一家住在上海一條幽靜的馬路上的一幢兩層樓房裏。四周花樹簇擁，屋後綠草如茵，活像一個小花園。……樓下寬敞的客廳，陳列着杜甫的石刻像、齊白石的「殘荷」畫絹，以及白俄羅斯一位雕塑家給巴金精琢的青銅色半身像；明亮的玻璃櫈內，閃爍着各種精緻的禮品。他樓上的書房和工作室裏，擺滿了各種文字的書籍，……他常常開動電唱機，與家人一起欣賞「川戲」「京劇」和西洋古典樂曲。」

這樣一對照，胡萬春文中的××不是巴金還是誰？要知道，在正式報紙上標明××的已經非同小可了，因為王光美、胡喬木全是××，馬思聰是連××也未有呢。

巴金今年六十四歲了，他在文藝圈內一向以老好人兒稱。有愛、有熱情、極重友情、樂於助人。近幾年已發福，早有關節炎的病。如今是已經證實，他正受着精神與肉體的雙重虐殺。「作家巴金」的作者說他「生活安定」，他自己說：「做一個新中國的作家，是最幸福的。」竟然全成了最尖銳的諷刺！

### 由「香花」變「毒草」的曹禺

中國話劇作家，以作品之謹嚴，演出之效果、享譽之隆盛而言，至今還無人能夠超過曹禺。話劇這一文學形式，本非國產，乃是來自外洋，因此就不能不向西方劇作家的大牌有所取法。取法乎上，

僅得乎中，自然無法和外洋比，一比就會相形見拙。可是若與中國的話劇作家比，那又不同，曹禺總是佼佼者。如說曹禺膚淺，則郭沫若、田漢、老舍、洪深等就更膚淺了。

在三十年代初期，曹禺的「雷雨」出現於話劇舞台以前，中國話劇已有三十餘年歷史，可是雖經從外國回來的留學生們大力提倡，業餘和職業劇團不斷演出，但總不能普及，不能跟戲曲爭衡的。「雷雨」一出，驟然使人對話劇刮目相看，戲曲觀眾也能接受，這不能不歸功於曹禺。假如有人統計，三十餘年來，話劇劇目演出的次數，當以「雷雨」為最多。這是事實，並非因為沒有研究過西洋劇，便無知盲目，胡亂吹捧曹禺。

曹禺的劇作自「雷雨」之後，直至到「解放」之前，還有幾個劇本，如「日出」「原野」「北京人」「家」「蛻變」等，亦皆為人所樂道。就因為他有這份「本錢」，中共把他爭取了去，「解放」之後，即成為黨員，讓他在「文聯」裏面主管話劇創作的事。不久，中央戲劇學院成立，他做了副院長，正院長是歐陽予倩。又不久，北京人民藝術劇院成立，他又做了院長。至於他所擔任的劇協副主席，只是掛名，因為那是田漢的管轄範圍，黨歷比他久。但他總算有了一个寶缺，遠比老舍、巴金只在文藝團體中任職好得多，這就是黨員作家與非黨員作家不同的待遇。

雖然如此，可是當田漢在改編戲曲、歐陽予倩在改編西洋舞劇、老舍在創作話劇相繼出籠時候，曹禺還一個字也沒有寫出來。一九五二年文藝大整風，他曾作了這樣的檢討：「我不熟悉工人，不熟悉農民，不熟悉士兵，也不知道馬克思列寧主義。一套套的超級的善惡是非的觀念，若隱若現地深深扎在我以往的作品裏，有的甚至很猖狂地叫囂起來。我好說我痛恨黑暗的舊社會，不滿意人壓榨人的血腥事實，也說必須推翻封建勢力、官僚買辦的萬惡統治，可是我却是一個超階級的人性論者，我相

信在那樣的階級社會裏，人性也是普遍的善良的。我到過淮河，參加過土地改革，在那短促的時間，我會犯了些錯誤，靠了群中的幫助，得到了及時的糾正，我還不會寫出一個字來。」像他這樣的未寫一字的人，在大陸不是個別的例子。

此後他就下工廠體驗的生活，寫出了「明朗的天」，然而失敗了。失敗在先立主題，沒有戲劇衝突，成了今昔對比，歌頌當今的概念化的東西。因此，在一九五五年，「文聯」開辦「辯證唯物主義講座」時，他和歐陽予倩、田漢、老舍、艾青、周立波、曹靖華、翁文灝、俞平伯等，全報了名去聽講。當時的講師是：楊獻珍、孫定國、艾思奇、周揚四人。凡聽講的人，都要認真作筆記。那時曹禺會說：「要學習馬列主義哲學，才能看到生活的本質。過去如果能多學一些哲學，相信『明朗的天』會寫得更好一些。」似乎他並不承認他的新作是失敗的。

他非常謹慎小心，不敢隨便寫作，很聽話，諸如出國訪問、接待外賓、下鄉下廠、學習毛著、寫遵命文章等等，叫幹什麼就幹什麼。這樣，一關一關地僥倖度了過去。在鳴放時他曾吐了吐苦水，說想寫作，只是害怕犯錯誤，這也不對，那也不對，終於未敢動筆。一到反右整風，他嚇得病了，進了醫院。幸好沒有多說過分的話，中共放過了他。

「解放」後，他的舊作品，單行本和選集，都再版了數次。同時，因為中共一直在鬧劇本慌，他的舊作也一直在舞台上演不輟，仍然大受歡迎。由於版稅和上演稅的收入，不虞金錢的匱乏，他曾首倡減低版稅和稿費，得到全國的「響應」。這一倡議，討好了中共，却害苦了那些沒有豐富版稅收入的窮苦作家。為了自己生存，不顧別人生活，甚至陷害別人，是大陸上普遍的風氣。環境迫人如此，固不能單怪曹禺。傳統的私德和公德，早已蕩然無存。

一九六一年，他和于子之、梅阡等合作了話劇「贍劍篇」，由他執筆。這是中共指定的任務，藉越王勾踐的故事，教育人民餓着肚子努力生產，以吳王夫差影射赫魯曉夫。在當時一百多個同樣題材和主題的劇本中，還是「膽」劇較像個樣子，無愧為大手筆。但這仍是遵命文學，「載道」作品，不能算作曹禺自己的創作。要讓他自己寫，決不會寫成這個樣子，其實，他自己也未必選取這等腐朽的題材。

柯慶施在一九六三年元旦號召大寫十三年，到了年終舉行華東區現代話劇會演，曹禺從演出的劇目中，挑選了「龍江頌」和「豐收之後」，為文加以贊許推薦，予以很高評價，這也不是由衷之言，很可能又是遵命而作的。在一九六四年京劇現代戲會演時，他曾出席閉幕式，代表文藝界祝賀。那時毛澤東已很顯明在藉京劇會演掀起文化大革命，可是曹禺還裝作不知，在賀詞中提倡下鄉下廠，說作家藝術家下放，就是文化革命。這樣地假裝糊塗，是他的明哲保身之道，可見他是如何小心，然而語氣之間已露出他是這樣提心吊膽。

如此小心謹慎，畢竟沒有逃過這次文革的關。一九六六年，他參加中國作家代表團，出席在北京召開的亞非作協常設局會議，是他最後一次在報紙上見面。就這最後一次的露面，在著名作家中也只有他和巴金二人，其他早已「失踪」了。今年初，在北京出現的大字報，已經不止一次把他的名字引進了黑幫行列。四月，開始鬪爭中國的赫魯曉夫時，他做院長的北京人民藝術劇院的紅衛兵，發表了一篇攻擊頭號野心家的文章，其中有一段話是這樣說的：

「為了配合黨內頭號走資本主義道路當權派抗拒對資本主義工商業的社會主義改造，北京人藝搬出了一個美化資產階級，鼓吹人性論，宣揚階級調和的所謂『五四以來的優秀劇目』。黨內走資本主

義道路的當權派和反動的學術「權威」，很懂得這是一場階級鬭爭，是在話劇舞台上向社會主義挑戰的一次嘗試。他們嘔心瀝血，竭盡全力排練了八個月。為了演得「像」，導演率領演員和工作人員到北洋軍閥和許多社會渣滓們的家裏去「體驗生活」，管老寄生蟲叫「老太爺」，和一群吸血鬼打得火熱。排練場上，更是一片惡濁氣。」

這正是一九五三年的事，該院上演曹禺的「雷雨」。該文又說在上演時，「黨內頭號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來看戲了。他看完這個美化資產階級的戲後，讚口不絕，連聲說：『深刻！很深刻！非常深刻！』……黨內頭號走資本主義道路當權派為這個戲這麼一打氣，就把資本主義、現代修正主義和三十年代劇目在全國泛濫的閭門打開了後，於是大量毒草上市，社會主義的舞台被『死人』『洋人』統治了。」

這裏並沒有點曹禺的名字來，但他的「罪行」顯然已經「滔天」，因為他與劉少奇配合而反毛，這還了得！不用問，曹禺早已失去了人身的自由，受着紅色小將的折磨，雖然至今還沒有正式報刊的報導，却並不等於他還沒有被鬪爭。

單就「雷雨」言，在大陸再版和上演以前，曹禺曾作過修改。不止劉少奇說好，恐怕說好的不在少數，要不怎麼一連好幾年都在演它呢？可是現在紅衛兵却說，當時廣大工農兵反對它，一位戰鬪英雄看了以後說：「這個戲裏一個好人都沒有，搞階級調和。」戲劇報會收到許多批評文章，却被扣壓起來沒有給發表。這當然是後來追加的話，所謂羅織罪名之類，此外，北京人藝還演出過吳祖光的「風雪夜歸人」、田漢的「關漢卿」和西洋一些古典名劇，把這些「罪名」全加在曹禺身上，恐怕很難再邀赦免。這樣的一個劇作家如此無聲無臭地收場，聞之者能只發出一聲歎息麼？

## 不偷生以取辱的老舍

老舍成名於二十年代。他在倫敦東方學院教中文時，與許地山住在一起，受了許的鼓勵，寫成了他的處女作「老張的哲學」。許是文學研究會發起人之一，請他寄給該會的機關刊物「小說月報」發表，他用本名「舒慶春」把稿子投到該刊。

那時「小說月報」的主編，已由茅盾換上了商務印書館老闆的愛婿鄭振鐸。鄭出身於北京鐵路管理學校，雖然酷嗜文藝，總是見聞不廣，他一見「舒慶春」這個名字很陌生，「老張的哲學」中又有些油腔滑調，將它壓在一邊，一壓就是半年。後由許地山來函催問，向鄭說明老舍的來歷，這才在「小說月報」上發表出來。第一次用的真名，以後連載就改用「老舍」這個筆名了，因為小說的風格特殊，立時轟動文壇，老舍的大名，遂不脛而走。到了三十年代，老舍的長篇已有七八部出版了，與茅盾、巴金並稱為三大長篇小說家，他們的作品給予當代青年以很大影響。你到北平租賃小說的舊書鋪去看，只有他們三人的作品，足以和當時最為流行的如陳慎言、張恨水的章回小說抗衡。有這樣可以利用的價值，就無怪中共要爭取他們了。

老舍是個老實人，老實得有些傻，被人利用做工具，往往不知其被騙。抗戰時，他主持「文協」的總務部，瓦八年之久，任勞任怨，忠心耿耿。那時「文協」是中共搞統戰的團體，內部問題甚多，中共暗中操縱，聯甲倒乙，老舍却一視同仁，從不得罪人；人家得罪他，他也不以為忤，照常嘻嘻哈哈。梁實秋主編「中央日報」的一個副刊，曾為文諷刺「文協」，左翼人馬鼓動反擊，在「文協」機

關刊物「抗戰文藝」發表的那篇不具名的質問梁實秋的文章，就是出於老舍的手筆，用的是文言文。他爲中共無形中做了不少的事，也無形中讓庇了不少的共黨作家。有人慇懃他，他就勇往直前，把別人的詭計誤以爲正義，像小孩子那樣極得天真。

大陸「解放」時，他在美國。「文聯」給他預留了許多空位等待他。歸來之後，文聯、作協、政協、人大……正副主席、理事、職務多得連他自己也數不清，可惜沒有一個是有權的。然而也並不閒散，出國訪問，接待外賓，參與會議，還要寫作，使他忙得喘不過氣來。這樣，他以老病（有腿疾）之身，仍然寫出了很多作品，從「龍鬚溝」起，單只劇本就有十餘部之多。在文藝方面，他是全才：會寫會畫、會唱京戲、大鼓、說相聲、雙簧；長短篇小說、話劇、戲曲、歌劇、曲藝，寫來一無不精采。三十年代作家，在「解放」後多淪的就是老舍。

馮雪峯以文聯副主席的頭銜主編「文藝報」時，曾指着老舍鼻子罵，罵他寫的「方珍珠」不好。他不敢出聲。周揚當面封他爲「語言大師」；彭真當面封他爲「人民的藝術家」，他也樂於接受，大陸有個騙子，名叫李萬銘，假裝韓戰的榮譽軍人，從縣級政府騙到中央的部會，中共拿他當做英雄，配給了他一位美麗的愛人，相偕各地遊歷，二年之後才爲公安部門識破，加以逮捕。羅瑞卿在人大二次會議報告了這件事，叫老舍以此爲題材，寫一個劇本，他就寫出了「西望長安」。中共有什麼號召，或贊揚什麼，或反對什麼，他都遵命爲文，從不偷懶。有一次，中共要整頓文風，要他申述意見，他就老實地提出，「爲×××而鬪爭。」這樣的句子已成陳腔爛調，應該避免，不想竟撞了大板，受到批評，但他也處之泰然。

他的個性如此，在那樣的社會環境裏也不得不如此，明哲保身之道在於糊塗，他都做到了，照說

應該可以苟全性命了。然而去秋突然出現了紅小鬼，張牙舞爪要噉他，他爲了免於被殺而先自殺，不偷生以取辱，終於未能糊塗到底。

老舍遺下的是什麼呢？有他的做畫家的太太胡潔青女士，有已經能自立的兩個兒子和兩個女兒；還有，他忙裏偷閒養的二百盆名貴的菊花！

至於他的作品，那是中國文學的財富，像他這樣作風的作家，還找不出第二人。「解放」後的雖說遵命而寫無可觀，但是「茶館」和「西望長安」仍然可傳，因爲在這兩個劇本裏，他技巧地用了一些曲筆，烘托出一些當時的社會主義社會的真實。

## 冰心女士自殺了麼？

人皆知她本名謝婉瑩，卻很少人知道她最早的名字叫謝星朗。她那一首小詩中的「繁星」，並把第一個詩集命名「繁星」，可能和她最早的這個名字有關係。她應該是「五四」時代的作家了，到了三十年代的初期，「冰心全集」已經出版。她是早慧的一位才女，用「冰雪聰明」形容她，不算過火的，像兩宋之間的易安居士那樣，一遇時序更換，便會觸景生情，無端傷春悲秋起來。她自幼嬌生慣養，父母疼愛備至，從未遇到過拂逆心性的事，然而弱軀多病，易於傷感。曹雪芹筆下的林妹妹，正是中國過去這一類才女的典型。郁達夫說：「我以爲讀了冰心女士的作品，就能夠瞭解中國一切歷史上的才女心情；意在言外，文必已出，哀而不傷，動中法度，是女士的生平，亦是女士的文章之極致。」這是對於她爲人和爲文的一個很恰當的概括。

逃到美國的馬瑞雪小姐說，她在大陸聽到傳聞，冰心不堪紅衛兵的鬪爭，已經自殺。難道是真的麼？馬小姐又說，老舍是因為紅衛兵鬪爭他，他起而反抗，給紅衛兵亂棍打死的。在先我不信老舍會自殺，如果傳聞屬實，這才是老舍！冰心則否，她是多病的柔弱女子，在大陸又受了整整十五年的折磨和非人所能堪的勞累，實在無力反抗了；又加她的先生在五七年已送入勞改營而失蹤，她是會自己結束自己的生命的。作為一個四十年前就熱愛她的作品的讀者，真替她後悔不已。十五年前，本在日本東京教授中國文學，好好兒的，幹麼要自投羅網，到魔鬼統治的地方去呢？

二十年代時，新文壇上的女作家，但除了冰心以外，還有盧隱（姓黃）、CF（張近芳）、陳衡哲、凌叔華、袁昌英、蘇雪林等人，但以冰心的名氣最大。她的作品，在「小說月報」上刊載的比較多，因為她是文學研究會的一員。記得一九二三年秋，她赴美留學時，是與梁實秋、許地山、顧一樵等，一同搭乘約克遜輪船去的；在太平洋中他們寫了十四篇詩和散文，寄給鄭振鐸，給刊在「小說月報」上，她寫的三首詩：「鄉愁」「惆悵」「紙船」。那時該刊凡登女作家的文章，署名全都有「女士」二字，因此更引起讀者的注意，男人固愛女子的作品，女人亦愛讀同性的文章。筆者也不例外，每逢「小說月報」一到，先看有無她的作品，如有，那就摒除一切，先讀為快。如今想來，冰心的作品給予讀者的印象特深，也許是她沾了「女士」二字的光吧。我這個話並無貶抑她的作品的意思，而是指出她在當時所以凌駕那些「男士」之上的一個原因而已。當時「男士」中那些大牌作家可多啦，像沈雁冰、葉紹鈞、王統照、徐志摩、徐玉諾、許傑；還有瞿秋白、張聞天、沈澤民（茅盾之弟）等等，在讀者心目中，都不及冰心之受歡迎。

冰心在威爾斯學院得了文學碩士歸來後，任教燕京大學，寫作反而少了。抗戰時，她任國民參政

員，用「男士」筆名發表了一些散文，後來輯印成冊，書名「關於女人」。當時讀者全不知是她所寫的，她也故意不用她原來慣用的筆調，寫女人心理，細膩深至，人們都奇怪，這個「男士」是誰呀？後來一打聽，才知是冰心，人們這才恍然：怪不得！這書曾暢銷一時，似乎她在以事實證明她之成名並非沾「女士」的光吧。

在大陸十五年，寫得更加少了。主要原因是不敢動筆。中共看重她在美國所寫的「寄小讀者」曾受廣大中小學生歡迎，叫她和陳伯吹、張天翼、劉真等從事兒童文學的創作。她只寫一本薄薄的「陶奇的暑假日記」，假借一個少先隊員的口吻，來歌頌美麗的新社會。好作品要真感情，像這種代共黨宣傳的勞什子，違心地硬把膾包寫成蓓蕾（艾青語），什麼人也寫不好的。她寫「寄小讀者」時，是自由地寫出她童心中不足為大人道的可驚可笑之事（她自己的話），所以就不能比了。

「五四」火燒趙家樓那一年，她才入協和女子大學。舊時她當選為學生自治會的文書，也參加了罷課遊行。

一九五八年，她曾遵命寫「回憶五四」的文章，——有人知道她這件事，她推脫不了——最後有這樣一段自我檢討：「在五四運動時期，我還根本不知道五四運動是受着十月革命的影響，是受着有共產主義思想的人們像李大釗同志等人的領導。我的資產階級家庭出身和所受美帝國主義奴化教育，以及我自己軟弱的本質，都是五四對我的影響，僅僅限於文學方面——以新的文學形式來代替舊的形式這一點。

「五四過後，我更是『閉關自守』，從簡單幼稚的回憶中去找我的創作的源泉，我的脫離羣衆的生活，使我走了幾十年的彎路，作了一個空頭的文學家。但是現在我並不難過，只要一息尚存……」

然而八年之後，她即使仍這樣誠懇地認罪懺悔，也不被准許偷生苟活下去了。

## 丁玲去了何處？

在冰心之後，飲譽文壇的女作家，當推丁玲。二人作風迥然不同：冰心以清麗俊雅的文筆，表達出一個大家閨秀的錦繡才華；丁玲卻是以直率潑辣的筆觸，大膽地抒寫變態心理的女子愛情。北伐時期，中國社會因大動亂而急劇轉變，讀者的口味，已不再鍾意那種柔情萬種的傷春悲秋，反而喜歡看馳騁原野的馬和翱翔天空的鳥。以女作家言。那時謝冰瑩的「女兵自傳」非常引人注目。在此以前，「創造周報」刊出淦女士的幾個短篇，寫少女掙脫束縛而勇敢熱戀的故事，令人有石破驚天之感的。（淦女士是馮沅君的筆名，她是馮友蘭的妹妹，陸侃如的夫人。）惜皆只曇花一現，後作不繼，不得不把取代冰心在文壇上的地位讓給丁玲。

丁玲成名很早，約和沈從文、巴金、老舍等同時。有名的「莎菲女士的日記」，是一九二七年在「小說月報」發表的，還不是她的處女作。這篇小說的主人翁莎菲，就是她自己。關於她的家庭和她在一九三三年被捕以前的歷史，她寫過一個自傳式的長篇「母親」，沈從文寫了一本「記丁玲」，都記載得很詳細。（編者按：請看另一篇退休間諜的「反反覆覆話丁玲」。因為丁玲就是退休間諜先生的俘虜，她被捕及逃脫的情形，該文有詳細的記載。）

去年林語堂博士首次回香港，徐速兄在樂宮樓為他洗塵，邀約了幾位朋友作陪。大家會談到了丁玲。易君左兄說，丁玲是他的學生，那是丁在長沙周南女子中學讀書的時候。她的英文不錯，那時已經喜